

丁 宏

# 韩国政治转型过程中的 市民社会变迁

**[内容提要]** 韩国作为“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的代表性国家,在短短的 20 年间,继令人瞩目的经济腾飞之后,实现了从威权主义政治向政治民主化的转型,其中韩国市民社会发展和民主化运动的高涨被认为是政治社会转型的关键性因素。本文对韩国政治转型与市民社会变迁之互动过程进行考察与分析,探究市民运动作用于政治转型的作用模式和途径,揭示其在民主化进程中为其他国家提供的经验和借鉴。

**[关键词]** 民主化 政治转型 市民社会 市民运动

中图分类号:D73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369(2010)6-0161-09

## 研究背景

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中,韩国的政治转型过程及成就引人注目。“六·二九”民主化宣言的发表,标志着以全斗焕和卢泰愚为代表的威权统治势力向以金泳三和金大中为代表的民主化势力的全面妥协,韩国政治实现了由军人政治向民选政治的和平交接,开创了战后韩国宪政

---

收稿日期:2010.8.15

作者简介:丁宏,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副研究员、博士,韩国东亚大学访问学者,210013。

史上的先例。这一被称作是“通过妥协而实现的民主化”<sup>①</sup>或“移转式的民主化”<sup>②</sup>实现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了菲律宾的示范效应、美国的外在压力以及经济现代化的助推等,其中韩国市民社会的逐渐成熟和市民运动的蓬勃发展被认为是在韩国民主化的过程中发挥了特别突出的作用。市民社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韩国民主化的进程,它通过何种途径发挥作用,本文希望通过韩国政治转型及市民社会发展的历史互动考察来寻找这些答案。

### 市民社会理论回顾:从古典到当代

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指的是古希腊的城邦(state)。在这里,市民社会和国家在概念上基本是重合的,这一状态一直延续到17世纪的洛克时代。洛克把“市民社会”与“自然状态”进行对照,“自然状态”是无政府的社会,“市民社会”是有政府的社会,因此在这时“市民社会”又被称为“政治社会”(political society)。<sup>③</sup>19世纪时德国思想家黑格尔和马克思把市民社会和国家进行概念的明显分离,所不同的是黑格尔视国家为市民社会存在的前提,认为市民社会是不自足的,这种不自足性只有靠政治秩序化才能解决;<sup>④</sup>而马克思在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的同时形成了自己的“市民社会-国家”框架,马克思把市民社会视为“物质生活关系的总和”,对国家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sup>⑤</sup>从而把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和国家关系的认识颠倒过来。

与当代市民社会理论有直接传承的应属19世纪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他对美国民主的考察中,发现一个由志愿性社团组成的活跃的、强有力的公民社会对于遏制多数专制是必不可少的。托克维尔的民主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政治民主,即以扩大公民权为基础的代议制;另一种是社会民主,即一种平等

① [韩]安清市等编.转换期的韩国民主主义:1987—1992.法文社,1994

②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

③ [英]约翰·洛克.政府论.商务印书馆,1997

④ [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6

⑤ [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72

被普遍接受为根本价值的社会状态。政治不民主有可能导致政府集权,社会民主可以消除这些政治危害性,是政体发展的方向。<sup>①</sup>托克维尔之后,市民社会的概念因政治哲学家注意力向工业革命所引发的政治社会变迁的转向而沉寂一时。

市民社会理论在当代的复兴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当时西方和东欧的知识先锋发现了这一概念在组织民众对抗极权主义并重新界定社会与国家关系的有用性。葛兰西重新启用市民社会这一术语,将其描绘成独立政治活动的特定核心和反对专制统治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领域。葛兰西的思想对于捷克、匈牙利和波兰的活动家有着巨大的影响,波兰团结工会甚至直接打出了争取建立一个“市民社会”的旗帜。Keane充分肯定了市民社会运动在苏联东欧民主化变革中的关键性作用,他认为,极权主义体系更容易产生于市民社会的结构还没有充分形成的环境中,而阻止它们发生或促使其大垮台的最可靠的途径就是培育市民社会的发展。<sup>②</sup>当代市民社会概念曾经历了从国家和社会的“二分法”(two-part model)向国家、市场经济和民间社会“三分法”(three-part model)的历史演变。<sup>③</sup>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三分法的市民社会概念被国内外学者们的普遍接受并广泛流行。按照这种三分法,公民社会概念是指相对独立于政治国家与市场经济组织的公民结社和活动领域,包括个人私域、非政府组织、非官方的公共领域和社会运动等四个基本要素。<sup>④</sup>这一概念也吸收了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对于公共领域结构性变化的研究成果。<sup>⑤</sup>

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的核心是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这也是本文所关注的焦点。将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简单地归结为对抗抑或合作的话可用两种模型来概括:一即“市民社会与国家协作模型”,Berman称为“新托克维尔理

---

① [法]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2006

② Keane J. Civil Society: Old Images New Visions.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8

③ Carver T. Civil society in Japanese politics: Implications for contemporary political research.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2000(37)

④ 何增科.全球公民社会引论.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2(3)

⑤ [德]尤根·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性变化//邓正来等编.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

论”,<sup>①</sup>因为其思想内核来自托克维尔对于志愿性社团在发展民主过程中作用的思考,该模型强调市民社会对于民主国家治理的积极作用。Putnam通过对意大利南北地区的对比研究后发现,如果某国家或地区的市民社会水平较高,那么市场机制的运行就会较有效率,政府也会较为廉洁和有较高的效率。<sup>②</sup>他的另一名作《独自打保龄球:美国下降的社会资本》则表示了对美国民众社团参与度降低而导致的社会资本和信任减弱的担忧。<sup>③</sup>另一模型为“市民社会反对国家”模型,它有两个分支:市民社会反对威权国家模型,以及市民社会反对民主国家模型。这一模型强调市民社会削弱国家的负面作用。在威权国家里,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是一种压制与反抗的关系。市民社会要想获得自己的生存空间,只能同威权国家斗争。在民主国家里,如果没有适当的平衡与约束,它也有走向专制的危险,所以市民社会要作为一种制衡国家权力的力量而存在。

## 韩国的政治转型与市民社会变迁

1948年韩国在美国的帮助下进行了第一届国会即“制宪国会”的选举,1952年第二届选举时实行了总统的全国直选和地方自治,由此奠定了韩国民主政治的框架。然而与美国想把韩国建设成为“民主的橱窗”的愿望相悖,李承晚政府事实上的独裁和在选举中的舞弊行为激起了“4·19学生运动”,导致李承晚下台,韩国进入了以许政为代总统的“过渡政府”时期和张勉政府时期。续任的民主党政府把李承晚时期的问题归结为民主不充分的结果,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扩大民主。但这一选择意外地没能得到民众的拥护,民众对经济停滞、社会贫困、官场腐败等的忍受能力已经达到了极限,需要一个强势政府来解决这些问题。而民主党的改革却进一步分散了权力,致使政府难以任事,导致社会不满和动荡急剧增加。1961年5月16日以朴正熙为首的军事集

① Sheri B. Civil Society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World Politics, April 1997

② Putnam R D. Making Democracy Work: Civil Traditions in Modern Ita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3

③ Putnam R D. Bowling alone: America's declining social capital. Journal of Democracy, 6, 1995a

团借机发动了“旨在把我们的国家从动乱和毁灭中拯救出来”<sup>①</sup>的政变,由此韩国进入了军人执政时期。

O'Donnell 提出了官僚威权主义的“发生模式”。他认为,一旦传统官僚无力解决经济发展面临的瓶颈,而此时不满的社会阶级高度动员,政府对社会容忍所要付出的成本必然迅速提高,当容忍成本明显高于压制成本时,以“压制阶级,提升政府能力”为号召的官僚威权政体就会出现。<sup>②</sup>因此威权主义政府具有两个看似冲突的诉求:维护一种高压统治制度与通过发展增长型和出口型经济建立一个富强、繁荣的国家。在这期间,韩国的市民社会受到严密的控制,公民被迫保持沉默。

朴正熙统治期间韩国经济实现了起飞,并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韩国的经济发展走的是一条在政府领导下实现资本主义工业化的道路……政府凭借国家的力量制定经济计划,确定发展目标和发展方向,并有效利用各种资源,从而推动经济走向高速增长。”<sup>③</sup>经济发展的成功为军人统治找到了一些合法性依据,然而从长远来看又造成了其合法性丧失的危险。威权政治的合法化有着上限和下限。下限是政府的绩效必须超过某个最低水平线;上限是如果政府绩效超过了一定的水平,它就不能为威权政治提供合法性,因为如果社会经济条件通过成功的政府绩效得到了改变,威权政治体制就完成了使命而不再是不可缺少的。<sup>④</sup>亨廷顿指出,“从长远的观点看,经济发展将为民主政权创造基础。从短期看,迅速的经济成长和经济危机会瓦解权威政权。如果在没有经济危机的情况下实现经济增长,民主将能够缓慢发展”<sup>⑤</sup>。

亨廷顿的观点在韩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验证。到上世纪 80 年代,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四小龙”之一的韩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城市化率达到 80% 以上,中产阶级也接近总人口的 50%,从而使市民社会

① [韩]朴正熙.我们国家的道路.华夏出版社,1988

② O'Donnell G. Modernization Bureaucratic Authoritarianism: Studies in South American Politics. Berkeley: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3

③ 任晓.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④ 毛寿龙.政治社会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⑤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

的成熟和民主政治的发展获得了坚实的基础。中产阶级要求与其经济地位相适应的政治权利,在民主运动中相当活跃。1979年朴正熙遇刺后,韩国市民运动一度非常高涨,出现了所谓的“汉城民主之春”。在随即以全斗焕为代表的军方强硬派重新掌握政权后,学生运动、工人运动等社会抗议运动不绝,1980年5月,军政府以暴力镇压光州的示威民众,造成千余人伤亡,史称“光州事件”。血腥的光州事件并未能使韩国社会运动就此中止,并在1987年6月达到了最高潮,以“实行直选制改宪”为目标的“六月抗争”是以学生、市民和中产阶级为中心的民主运动,是全斗焕上台以来参加人数最多、规模最大、冲突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民主势力与威权势力的对抗。<sup>①</sup>在市民运动的压力下,民正党终于作出重大让步,由代表委员卢泰愚发表了作出改革承诺的“六·二九”宣言。“六·二九”宣言是韩国政治变迁的分水岭,此后尽管经历了一系列重大危机,但是民主政治的进程已经不可逆转。<sup>②</sup>

## 韩国政治转型中的市民社会分析

### 1. 韩国的政治转型与市民社会的作用模式

亨廷顿把政治转型分为三种模式:(1)变革(transformation),即执政的精英领头实现民主;(2)置换(replacement),反对派团体领头实现民主,而且威权政权垮台或被推翻;(3)移转(transplacement),民主化主要是因为政府和反对派团体采取联合的行动而实现。<sup>③</sup>韩国属于比较典型的“移转”模式。韩国军人政府致力于经济现代化的措施,在这个过程中,其合法性的权力和权威受到了削弱。伴随着经济进步而产生的社会结构的分化孕育出新的利益要求、新的组织团体和新的社会力量,这些力量构成了政府的对立面并利用政府的削弱扩大其社会基础并加强其活动。威权政府曾作出强烈的反应来遏制和镇压反对党对政治权力的动员,这一反应在“光州事件”中达到顶峰。但就统治阶层内部而言,强硬派和改革派的分歧也一直存在,暴力镇压又经常导致政府利益的

① 董向荣. 韩国由威权向民主转变的影响因素. 当代亚太, 2007(7)

② 王来法等. 市民社会兴起的韩国政治变迁. 国际论坛, 2004(1)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 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 上海三联书店, 1998

最后受损。1979年对于釜山学生运动的镇压成为朴正熙被刺杀的导火索,在此之后,改革派崔圭夏上台,解除对金大中的软禁,宣布将进行政治改革,一度出现“汉城之春”的民主态势。随后强硬派全斗焕的重新掌权,其制造的光州事件及一系列的强制手段最后导致了1987年韩国社会运动的全面爆发。与置换模式不同,构成政府反对面的韩国市民社会对于旨在推翻政府的激进手段并不完全认同。如朴正熙的政敌金大中就反对对朴正熙的刺杀行为,“我们并不是靠着国民的力量打倒朴正熙政权的,而是靠着另一个军人的子弹得到了暂时而可怜的民主。”<sup>①</sup>朴正熙死后经济出现的剧烈动荡也使更多的普通民众,尤其是中产阶级对于青年学生和工人运动的过激行为表示不满并比其后的威权统治保持暂时的沉默。<sup>②</sup>也正是因为如此,反对派的领导人之一金泳三开始与政府的温和派金钟泌、崔圭夏进行谈判。这时,韩国政府和反对派中的主导团体都开始发现他们没法单方面地决定他们社会中未来政治体制的性质:反对派认识到自己还没有强大得足以推翻政府;政府意识到反对派强大到足以增加不谈判的代价,移转就这样开始了。这一过程在1985年韩国国会选举后更得到了加强,在这次选举中,成立不到一个月的新韩民主党一举成为第一大在野党,获得了在体制内与执政党进行对话的政治力量。亨廷顿认为在民主化进程中三项最关键的互动关系是政府与反对派之间的互动,执政联盟中改革派和保守派之间的互动以及反对派阵营中的温和派和极端主义者之间的互动。在移转过程中,中心的互动是改革派和温和派之间互动。<sup>③</sup>1985年的国会选举使韩国执政党内部分裂为保守派和改革派,以卢泰愚为代表的改革派最终与以金泳三金大中为代表的反对派进行妥协,发表“六·二九”民主化宣言,标志着韩国由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的正式转型。

## 2. 以1987年为分水岭的韩国市民社会特点

在这里对于韩国市民社会特点的考察主要通过两个关键性的维度:即志愿性团体(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韩国的市民团体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

① [韩]金大中.我的人生,我的路.外文出版社,1998

② Han Sung-Joo. South Korea: Politics in Transition // Sang Yong Choi, ed. Democracy in Korea, The Kore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Seoul Press, 1997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二十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

阶段:<sup>①</sup>第一时期是从20世纪初至1945年韩国建国之前,这是韩国市民团体的萌芽时期。最早的民间组织包括YMCA(1903年)、红十字会(1905年)和兴士团(1913年)等。第二时期是从韩国建国以后至1987年的“6月抗争”之前。这一期间除政府支持的少量“官边团体”外,其他非政治性市民组织受到严格的限制和监督,政治性社会团体被压制和取缔。有韩国学者又把其中的与韩国政治转型密切相关的市民社会划分为三个阶段:在1960—1961年的第一阶段,市民社会运动具有激进性和理想化的鲜明特点;在1973—1979年的第二阶段,工人和教会与学生在大规模的社会运动中结成同盟;在1985—1987年的第三阶段,市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和中产阶级在民主运动中结盟。<sup>②</sup>虽然这期间韩国市民社会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特点,但它们都明显具有反国家的性质,即通过批评、暴力抗议来反对军人统治的威权主义国家,符合“市民社会反对国家”的模型。这一反对过程可以通过该时期韩国劳工组织化和罢工变量来进行考量检验。作为市民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南韩的工会数量在70年代逐渐增长,参与工会的工人数从1965年的30.2万人猛增到1983年的170万人。罢工和停产的数量从1986年的276宗剧增到1987年的3617宗。在这一时期,韩国的劳工组织及工运是和其民主化进程同步发展的。<sup>③</sup>

韩国市民团体发展的第三时期是1987年“民主化抗争”之后至今。这一时期民间组织在数量上急剧发展,据朴祥熙在2001年的研究,1987后成立的市民组织占建国后成立市民组织总量的77.4%。市民团体活动的领域趋向多元化,涵盖了包括教育、经济、政治、环境、人权等近20个领域。<sup>④</sup>与市民团体数量增多的趋势相反,以批判、暴力为特征的社会运动明显减少,罢工和停产的数量从1987年高峰时的3617宗迅速跌落到1990年的322宗。以1987年为分水岭,韩国的市民社会从“市民社会反对国家”模型转向“市民社会与国家协作”模型。发现这一转向的原因首先当然是政治转型的成功。原来以民主

① [韩]郑准镐. 韩国市民团体的分类及与政府的关系. 中国行政管理, 2003(3)

② Sunhyuk, Kim. Civil Society in South Korea: From Grand Democracy Movements to Petty Interest Group?. *Journal of Northern Asian Studies*. Summer 96, 15(2)

③ 刘淳. 转型期的市民社会与社会秩序

④ [韩]朴祥弼. What is NGO?. Hanul Publishing House, 2001



化为号召的市民社会运动由于其目标的部分实现存在着对组织的再定位问题,这迫使他们由原来政府的“反对者”转向更为温和的“改革者”、“合作者”甚至“拥护者”。而这时期政府对市民社会的态度也发生截然的转变。金泳三首先提出要培育市民社会,作为政党的社会基础和政权合法性的基石。<sup>①</sup>政府主动培育市民社会,扩大与其合作途径,制度内沟通渠道的畅通使得韩国市民社会没必要再寻求暴力手段表达意愿,而开始与统治政府建立起合作而非对抗的新关系。这一合作关系可以被定义成共同协商(政策问题),共同生产并提供(公共服务)和共同参与。<sup>②</sup>向非暴力的转向还源于市民从“解放政治”向“生活政治”的转变。在一定程度的从不平等和奴役的状态解放出来的基础上,人们开始卷入进一步寻求完备和令人满意的生活可能性的过程中。<sup>③</sup>

## 结 论

截至目前,本文对于韩国政治转型及市民社会变迁的研究还是比较粗浅及浮光掠影式的,更深入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资料支撑或实证式的验证。在已有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韩国市民社会的发展与政治转型存在着很强的相关和互动关系,市民社会对韩国向民主的过渡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然而这一影响并非单方面的,其过程也是曲折的。经济条件、社会结构、文化背景、宗教因素以及外来压力共同造成了韩国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移转式转变。市民社会本身的边界和性质也是模糊而多变的,当威权政体对其进行遏制时,市民社会变得团结而显示其反抗能量,当民主政治扩大其合作基础后,市民社会倾向于变成一个竞争性的空间,或成为政权的“防护墙”。<sup>④</sup>

(责任编辑:张业亮)

---

① 陈周旺.金大中政治思想与韩国政党政治的转型//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编.韩国研究论丛(第八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

② 吴建华,郭智勇.协商民主的路径.学海,2009(5)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译林出版社,2000

④ [韩]韩相震.当代韩国的社会转型.江海学刊,2008(2)